浙江乌镇:“互联网+”激活基层党建细胞

新华社 俞菀

在浙江乌镇,许多党员干部还有一个身份叫“乌镇管家”;在乌镇,从镇党委书记到村信息员,手机上都有一个APP叫“乌镇民情”。互联网激活基层党建细胞——浙江桐乡市乌镇镇党委用“指尖”与“脚头”共同构筑起“红色堡垒”,党建与民意无比贴近。

“互联网+社会治理”,党建也可以“时髦”地“接地气”

“政府最大的目标和责任就是要使居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做任何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乌镇镇党委书记陶咏椿说,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乌镇以来,镇党委把“互联网+”的思维全面融入了党建工作。

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就是推进“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全覆盖,不断升级“APP+微信+二维码”模式。

“6月30日中午11点39分,虹桥村有重要客人身份证遗失,特急。”镇党委办公室的旁边,就是“乌镇民情” APP的管理服务平台。分布在乌镇16个行政村、3个社区的近千名基层党员,在巡查走访中,每天都会源源不断往平台输送民生诉求信息。

“大部分反映的是城市‘小毛病’,比如哪里有乱扔的垃圾,哪里有房屋、街道需要维修,车辆乱放乱停等。99%以上的诉求通过后台分派到有关职能部门,当天便可解决反馈。”乌镇镇党委副书记杨雪慷说。

与乌镇的基层党员一起走访群众,最大的感受是“时髦”+“接地气”。

一些村里的“党员先锋站”,由废弃的农舍改造而成,墙上挂满了党员深入群众的规范要求,江南水墨色的墙体涂鸦与鲜红的党徽相得益彰;村民(居民)家门口张贴着二维码,嵌入民情档案信息,党员干部走访要“扫码签到”;乌镇每一位老百姓都可以用下载的“乌镇民情”微信平台,直接@书记镇长反映诉求,重大事项会直接写入党建责任清单和党员干部们的“勤政周记”,逐级上报直到能解决问题的层面为止……

“互联网+活动阵地”,产业链上党建“扫盲区”

从旅游小镇、文化小镇到互联网文创小镇,乌镇的转型有声有色。

而当互联网企业、智能制造、电商平台、农村淘宝等互联网产业链在乌镇飞速崛起,党建不能缺位——乌镇镇党委副书记董树华说,通过“线上组织召唤、线下组织寻找”的方式,镇党委掌握了互联网产业领域党团员数量、分布情况等,并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等方式,适时组建一批党团群组织。

全国首个“互联网创客党群服务站”由此应运而生。线上的网络e支部、QQ党校、微信讲堂等载体,配合线下丰富的组织生活,扩大了党建工作的有效覆盖。

“搞互联网产业的,年轻人居多。说实话,他们大都‘神龙见首不见尾’,能在线上解决的事情绝不会拖到线下。”乌镇普众创客空间总经理李在中说,如何让这些年轻人主动“现身”,让空间“人气”提升? 党建提供了很好的抓手。

“互联网知识专题讲座”“如何看待网红经济”“创投对接咖啡沙龙”……记者在普众创客空间看到,线下主题活动相当丰富。据说部分活动的热度能赶上企业年会,时常是业界专家、团队骨干和闻风而来的党团员们齐聚一堂。

“互联网+人才培养”,时代进步仍不忘初心

浙江嘉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连小敏说,让党建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很好地对接、融合,这是乌镇智慧党建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互联网+思维,把最基层的党建细胞激活了。‘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老百姓的身边,都是党员在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实战中培养出了一支较高素质的党员骨干队伍。”

据悉,在乌镇2658名党员中,中青年占到2/3以上,他们中许多人,习惯了每天上班路上用手机刷“乌镇民情”,加班再晚也要对照任务清单,更新当天的“任务日志”,时刻以成为“互联网+党建”的复合型人才要求自己。他们中涌现出了“最美乡镇干部”朱天强、“千名好支书”杨丽芳、“最有人情味的的征迁干部”黄伟明……

无论时代如何进步,基层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都要不忘初心。浙江桐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根说,乌镇在“党建+互联网”上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注重用好互联网这把“利刃”——推出不合格党员“十条红线”,运用“党建红云平台”,开展“双先指数”考评,定制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电子党务体检报告”……

记者在《乌镇镇党建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重点工作计划表》上看到,今年乌镇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要完成57个项目。其中多数涉及到党员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项目完成期限明确,责任落实到人。

“千年古镇正在经历互联网跨界之变,始终不变的,是党建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连小敏说。

资金用途缺监管 卷款逃跑频发生

透视预付卡市场乱象

新华社 魏董华 吴涛

广东省消委会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广东2015年预付卡投诉受理案件数量超过7000件。记者在广东、浙江等地调查发现,目前,在餐饮、美发、美容、健身等行业,预付卡消费几乎成为“标配”,一些商家用各种手段吸引消费者预存大量现金,但有些涉嫌变相融资、非法集资,甚至出现卷款上亿元跑路的现象。

规模日增跑路频现,广东3年投诉翻倍

“发行预付卡是商家快速回收资金、吸引客源、绑定客户的手段,光靠卖次数或者店内消费,现金流根本跟不上。消费者使用预付卡能享受更实惠的价格。”杭州市一家面积千余平方米的健身会所的销售经理说。

这一看起来“双赢”的消费方式,却面临重重风险。

不少消费者反映,预付卡消费有很多“霸王条款”,交钱容易退钱难。广东省消协3月公布的一批预付卡消费侵权典型案例中,消费者李先生在广东艾力斯体育健身运动中心办理了30次游泳卡,用了11次后,被告之游泳卡过了九个月有效期,需要再交60元续卡才能使用。李先生表示,办卡时该中心并未提及有效期一事,且卡上也没有注明。

如果遇到公司倒闭、老板跑路,预付卡的钱往往“打水漂”。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公布一起案例,深圳市博贝优品文化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有投诉105宗,投诉该公司关门倒闭,老板跑路,一些家长预付的万元学费“打水漂”。

此外,有些预付卡消费甚至涉嫌非法集资,今年初发生的水果营行倒闭事件就是典型代表。这家注册资本10亿元、号称要做“生鲜电商界阿里巴巴”的企业,通过“充1000元送1000元”“众筹入股”等方式,一年疯狂扩张300多家门店后突然倒闭。当时一名水果营行的联合创始人曾向记者透露,水果营行最终涉及的资金可能在3亿元以上。

随着预付卡市场越来越大,纠纷也越来越多。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2014年国内多用途和单用途预付卡销售规模为9068.8亿元,预付卡消费领域问题突出,除了约定不明、服务缩水,更严重的是有商家利用其变相融资、集资甚至诈骗。

来自广东省消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广东预付卡投诉案件从2013年的3131件增加到2015年的7195件,翻了一倍多,涉及金额也从3000多万元增加到5000多万元。

大量预付卡销售处于“三无”状态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虽然有相关文件规定预付卡消费须备案登记,并实行资金存管制度,但实际上大量的预付卡销售处于“三无”状态。

——无备案。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发布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前往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预付卡销售只有一半多经人民银行批准或商务部备案,大量发卡行为未纳入监管。上海全市发卡主体近10万家,而在上海市商务委备案的企业只有351家。

——无存管。按照《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规模发卡企业、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实行资金存管制度。其存管资金比例分别不低于上一季度预收资金余额的20%、30%、40%。企业需有专门的存管资金银行账户,当企业超额调用存管资金时,银行应拒绝并按照备案机关要求提供发卡企业资金存缴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这都需要以登记备案为基础,连登记备案都没有,何谈存管?

另外,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美容美发店、健身房、餐饮店等规模小,还达不到存管资金的标准。

——无监管。《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预收资金只能用于发卡企业主营业务,不得用于不动产、股权、证券等投资及借贷。但预售资金由商家任意使用的情况不在少数。

“钱收上来就是我们的了,留一部分用于日常运营之外,其他的想做什么都可以,哪怕是炒股也没人管。”杭州一家美容美发机构负责人说,商家不会主动对这部分资金建立专门的管理账户,可以随意支取,只要不倒闭就不会有事。

“大量预售卡既无备案,也无保障约束,一旦出现倒闭或老板跑路,消费者只能认栽。”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说。

应建立第三方账户监管预付卡资金

预付卡消费多数在民生行业,出现纠纷涉及面广。广东省2015年受理预付卡投诉7195件,涉及消费者8526人,其中群体性投诉22件,涉及消费者超过1000人。

与此同时,商业预付卡纠纷维权成本高,能最终通过司法救济获得实际赔偿的少之又少。“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发行预付卡的商户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即使可以为消费者追回本金,也难以对商户形成有力的威慑。”杭州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炜说。

朱炜建议,应落实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尽快建立第三方账户监管预付卡资金,改善预付卡资金安全仅靠商家自身信用的“单保险”模式。对30%的存管资金比例可适当提高,一旦商家失踪或者倒闭,由第三方直接将资金归还消费者。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建议,对预付式消费进行立法,重点解决预付式消费的准入、规范、监管及维权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探索采用信用监管、推行先行赔付等监管手段,引入行业连带担保等制度规范,整治和遏止预付式消费乱象。